

意识形态
YISHI XINGTAI XINGCONG
星丛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及其最新发展态势

汪行福 俞吾金 张秀琴 著

 人民出版社

意识形态 星丛

YISHI XINGTAI XINGCONG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及其最新发展态势

汪行福 俞吾金 张秀琴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星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 / 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1-017800-4

I. ①意… II. ①汪…②俞…③张…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1589 号

意识形态星丛

YISHIXINGTAI XINGCONG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

汪行福 俞吾金 张秀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3.5

字数：515 千字

ISBN 978-7-01-017800-4 定价：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导论 意识形态：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众所周知，法国学者特拉西于18世纪90年代创制出“意识形态”概念和相应的学说。当时拿破仑曾轻蔑地讥笑特拉西和其他意识形态家为“幻想家”。然而，始料不及的是，经过200多年思想史的洗涤，意识形态概念竟然持久地上升为当代思想界和理论界的重大问题。尽管西方在20世纪40—60年代一度出现过“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但有趣的是，意识形态并没有被终结，而真正被终结的却是这股短命的思潮。从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又出现了意识形态研究的高潮，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撰写的富有新意的研究论著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1989年“苏联、东欧的大地震”更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与某些学者的预期相反，意识形态概念非但没有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使更多的舞台灯光集中到自己的身上。进入21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减。无论是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是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症候

只要人们对当代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深入地加以探索，就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理论拥有某些共同的、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症候：

一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学术化。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概念差不多成了政治斗争的别名。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意识形态概念似乎也褪去了政治上的外套，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术语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高度重视。在他们论述意识形态理论的语境中，悄然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其一，他们不再把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特拉西作为政治家，而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开明学者、作为深受洛克经验主义和孔迪亚克感觉主义影响的哲学家而进行论述。

其二，他们发现，传统的哲学史教材在叙述 18—19 世纪的法国哲学时，几乎从未提到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然而，越来越多的当代思想家意识到了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哲学理论的重要性。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在《词与物》中甚至把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提并论。福柯这样写道：“在 18 世纪末，（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康德的）观念学（即意识形态——引者注）与批判哲学的共存，在两种彼此外在但同时的思想形式中划分了科学反思在一个预期将立即分解的统一性中所保持的东西。在德斯蒂或热朗多那里，观念学既作为哲学所能具有的唯一理性的和科学的形式，又作为能向一般科学和每个特殊认识领域推荐的唯一的哲学基础。”^① 福柯把观念学（即意识形态）视为最后的古典哲学，就像他把萨德的《朱丽叶》视为最后的古典叙事一样。

其三，他们不再对政治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史，而是对学术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兰克福大学的伊林·费·切尔教授和阿尔弗莱特·施密特教授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联合主办的意识形态概念史讨论班，就是这类学术兴趣的最好佐证。总之，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那里，随着外在的、剑拔弩张的政治格局的淡化，

① [法]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14 页。

意识形态理论愈益作为学术问题而得到相应的重视。

二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潮化。人所共知，思潮化与学术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学术研究也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的，但比较起来，学术更多地类似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的私人活动，而思潮则通常是社会性的，它更多地涉及现实生活，从而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如新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任何一个社会思潮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都会致力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从而建立相应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主要被理解为“官方的”思想，以便把它与“民间的”或“非官方的”思想区别开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人们不仅把官方的思想称之为意识形态，也把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非官方的思潮称之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仿佛退回到它的另一个名称——思想体系上，即只要有影响、有体系的思潮都可以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扩大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外延，也使它们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结合后获得了迥然各异的外在形式。

三是意识形态概念与文化概念的融合。如前所述，西语中的 ideology 在汉语中既可译为“意识形态”，也可译为“观念学”或“思想体系”，从词源上看，意识形态本来就是由一组思想观念构成的。与此相应的是，“文化”（culture）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人的活动所接触或改变过的一切现象，而狭义的文化概念则主要涉及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本来就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换言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边界是不明晰的，也是不确定的，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加以使用。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葛兰西就已经使用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样的概念。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更是把这两个概念如影随形地整合在一起加以使用。从一个角度

看，意识形态溶化到文化概念中去了，随着它的外延的扩大，它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被凝聚到意识形态中去了，从而平时作为背景和细节起作用的文化也被提升并整合到意识形态的权力磁场中去了。

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反思

毋庸置疑，上面提到的三个症候都扩大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外延，但同时也使它的含义变得模糊了，它的地位也渐渐由中心滑向边缘。所以值得我们加以反思的正是下面的问题，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其凯歌行进和“扩容”的过程中，如何保持住自己在思想世界中的核心地位？我们认为，要解答好这个问题，就应该重视对以下四重关系的探索。

一是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和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独立自足的东西，而不过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的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是指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它在内涵上始终是由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事实上，现实生活不仅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且也是促使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并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不但应该关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更应该关注它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因为任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发展的潜力，全在于它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是否密切。这种内在联系的存在也启示我们，尽管每一代人都在使用同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但已经赋予它以不同的社会历史内涵。所以，重要的不是停留在概念之争、文字之争上，而是深入地考察每个时代赋予这些概念或文字的不同的含义。总之，自觉地意识到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以前者作为参照系和出发点来引导、批判或检验后者，乃是甄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是否有价值的根本标准。

二是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管人们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做多么宽泛的阐释，他们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各种要素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政治权力。归根到底，意识形态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在思想观念上的集中表现。事实上，马克思早已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洞见意识形态的本质。反过来说，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意识形态的探索才不会停留在单纯的学术研究的领域里，而会进一步去探索隐藏在它背后的政治权力结构。毋庸置疑，只要沿着这样的思路探索下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就会上升为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内容。当代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们只知道扩大自己的阵地，却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显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有自觉地意识到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积极地探索这种联系，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才不会消散在细节和泡沫中。

三是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技术之追问》一书（1950）中，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区分了“手工技术”和“现代技术”。他认为，现代技术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也不再是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手中可以加以控制的工具，而是我们完全无法加以控制的对象。在1966年接受西德《明镜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海德格尔表示：“……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我不认为答案就是民主制度。”^①事实上，稍有观察力的人都会发现，现代技术不仅影响着人们对政治制度的选择，而且也通过其蕴含的主导性观念——合理性和有效性，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内涵。如果说，传统意识形态需要戴上神秘主义的面纱，因而对科学技术采取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度，那么，当代意识形态却抛弃了神秘主义面纱，不但把科学技术迎进了自己的王国，而且恭恭敬敬地把它置于王座之上。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于1968年出版的《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印证的正是当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历史性的嬗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只要没有自觉地反思它自身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那么它就还根本没有走出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樊篱。当代意识形态理论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是，探索科学技术与当代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探索的结果上升为新的理论。

四是意识形态与心理分析的关系。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都与“意识”（consciousness）处于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自从心理分析的理论兴起以后，意识形态与心理分析的关系就成了意识形态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基本关系。正是这一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使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获得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从未达到过的纵深度，尤其是通过对无意识的心理层面的分析，展示出意识形态与这一心理层面上的种种非理性因素的关系。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蕴藏在政治权力深处的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关联到这个无意识的心理层面。由于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客

^① 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3页。

观表现，而意志属于无意识心理层面上的非理性因素，因而合法性问题的根源也深藏于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齐泽克之所以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索中独树一帜，因为他娴熟地运用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传统。

三、朝着“元批判”和“去蔽”的思路

无数事实表明，对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索，仍然需要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汲取灵感和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马克思继承了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传统，并把这个传统提升到新的高度上。

众所周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经庄严地宣告：“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立法凭借其威严，想要逃脱批判。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怀疑，并无法要求获得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把这种敬重给予能够经得起它的自由和公开检验的东西。”^① 康德在其“三大批判”和后续的著作中，对他置身于其中的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然而，在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和“人是什么？”——中，“人是什么？”这个基础性的问题却被置于最后，而且由经验性的《实用人类学》一书加以探讨。由此，康德批判哲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如果连“人是什么？”这个基础性的问题还未先行地得到解答，怎么可能正确地解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和“我可以期待什么？”；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看来，实用人类学

①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A XII 注①。

作为来自感觉经验的不确定的知识，根本无法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要解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诉诸以“此在”（Dasein）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生存论的本体论。

由于批判地切入了黑格尔以来的历史哲学的视野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仅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品格，而且在识见上也远远地高于康德。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应该从人类首先不得不从事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去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论述，马克思使自己的全部批判理论获得了确定的基础和明确的出发点。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另一个重大的贡献是引入特拉西创制的“意识形态”概念，并按自己的方式把它理解并阐释为指称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的总体性概念。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当人们心安理得地以为自己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毫无瓜葛时，正表明他们的思想完全处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之下；反之，当他们自觉地起来反思并批判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时，他们的思想才可能真正地超越这种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既然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那么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元批判”（meta-criticism）理论，亦即最高层次的批判理论。事实上，不先行地实施这种批判，人们根本不可能同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保持思想上的距离，从而也根本不可能再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

原创性的思想观念。因为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它内蕴的问题架构操控着人们的全部思维活动和他们的问题意识，它只允许他们的思想永远在它许可的范围内绕圈子。由此可见，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始终对意识形态保持元批评态度的思想家，才有可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襁褓，独立地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并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那么，元批判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这得从意识形态的本质说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段被删去的文字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①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扭曲乃至遮蔽真实的人类史和现实生活。这就等于明确地告诉我们，元批判的根本任务是“去意识形态之蔽”。打个比方，就像人们走进原始森林，他们通常见不到真实的地面，因为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层的落叶，正是这些落叶把地面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了。也就是说，只有先行地清除掉这些落叶，真实的地面才会向他们显现出来。同样地，只能通过元批判去意识形态之蔽，真实的人类史和现实生活才会向他们显现出来。

综上所述，元批判和去蔽是马克思对批判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也使其意识形态理论始终保持其历史的高度而不坠落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我们走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迷宫提供了一条阿莉阿德涅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目 录

导论 意识形态：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1
第一章 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回顾	10
第一节 意识形态概念史的回溯	10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互动	18
第三节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24
第二章 “意识形态终结”之争	30
第一节 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30
第二节 阿隆：政治神话的破灭	37
一、对左派政治神话的解构	40
二、历史哲学的批判	44
三、“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	47
第三节 李普塞特：政治的终结	51
一、政治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	51
二、工业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56
第四节 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60
一、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的终结到意识形态化	62
二、意识形态终结的内在与外在原因	65
三、政治与乌托邦	68
第五节 来自左派阵营的责难	70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社会批判	81
第一节 马尔库塞：发达社会与意识形态	81
一、从内在批判到极权社会批判	83
二、单向度社会批判	88
三、超越单向度社会	97
第二节 布迪厄：符号暴力与社会区隔	107
一、意识形态与符号权力	109
二、意识形态与社会区分	114
三、天赋意识形态与趣味意识形态批判	118
四、从精英国家批判到新自由主义批判	123
第三节 吉登斯：意识形态与生活政治	129
一、意识形态理论：回归生活世界	130
二、现代性与现代意识形态反思	137
三、生活政治：乌托邦现实主义	147
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154
第四节 鲍德里亚：从消费社会到仿真社会	156
一、鲍德里亚与意识形态问题	157
二、物的体系与意识形态	160
三、对生产主义乌托邦的批判	170
四、真实的消失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174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	179
第一节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179
一、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形成与基本方法	181
二、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内容与范畴推展	186
第二节 霍尔的“文化大众主义”	194
一、霍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195
二、大众文化、政治霸权与多元链接	201

	三、文化大众主义意识形态论及其评价	211
第三节	伊格尔顿的“文化审美主义”	218
	一、范式转换：从认识论范式到社会学范式	219
	二、梳理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缘起与流变	225
	三、“文化审美主义”：在“文化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	235
第四节	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	241
	一、意识形态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242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传统与现代诸模式	245
	三、“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论的主要特点	254
第五章	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	261
第一节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262
	一、“阿尔都塞问题”	263
	二、质询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267
	三、暧昧的思想遗产	278
第二节	普兰查斯：意识形态与国家	283
	一、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	286
	二、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	291
	三、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294
	四、意识形态与政治分析	303
第三节	瑟伯恩：意识形态与权力	309
	一、重绘意识形态宇宙	310
	二、意识形态与主体性	316
	三、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320
	四、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	327
第四节	拉克劳：霸权与意识形态	336
	一、多元决定论：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338
	二、霸权逻辑：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343

三、错位逻辑：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354
第六章 意识形态与心理分析	365
第一节 拉康：镜像、象征与意识形态	365
一、自我认同与意识形态	366
二、意识形态与精神分析的自我批判	381
三、拉康的暧昧思想遗产	388
第二节 哈贝马斯：交往扭曲与意识形态	390
一、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变迁	391
二、精神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	398
三、对哈贝马斯理念的批判和反思	410
第三节 埃尔斯特：意识形态与心灵炼金术	416
一、埃尔斯特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417
二、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建	420
三、作为心灵炼金术的意识形态	426
四、意识形态与社会规范	433
第四节 齐泽克：实在界的凝视和意识形态的实质	438
一、意识形态崇高客体	440
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	447
三、钟爱实在界：齐泽克的立场	455
第七章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466
第一节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划界	466
一、“意识形态”与“科学”概念	467
二、认识论断裂与问题框架	470
三、理论实践：走出意识形态之路	471
第二节 马尔库塞：技术合理性与审美乌托邦	474
一、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本性	474

二、技术合理性	478
三、大拒绝与审美的乌托邦	485
第三节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491
一、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非难	492
二、合理化：探讨新的意识形态的入口	494
三、新的意识形态及其主要特征	496
第四节 芬伯格：技术整体论与技术民主化	498
一、重新定义技术：技术整体理论	500
二、“操作自主性”和“机动的边缘”	504
三、技术民主化	507
第五节 告别科学技术决定论	512
一、何谓“科学技术决定论”？	512
二、科学技术决定论在中国	516
三、如何走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误区	520
结论 从意识形态终结到意识形态泛化	523
后 记	527